

蓝袍先生

陈忠实 著

华夏出版社
典藏文库

蓝袍先生

陈忠实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袍先生/ 陈忠实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 5

(典藏文库)

ISBN 978-7-5080-9175-4

I. ①蓝… II. ①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74246 号

蓝袍先生

作 者 陈忠实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华夏出版社“典藏文库”，致力于展示中国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最高成就和学术成果，在题材、风格上表现出无限的丰富性。



作者像

陈忠实（1942—2016） 生于陕西西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65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白鹿原》，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初夏》《四妹子》，短篇小说《舔碗》《信任》《到老白杨树后面去》，散文《告别白鸽》等。

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报告文学奖等。1997年，《白鹿原》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入选“改革开放30年影响中国人的30本书”等。

目 录

蓝袍先生 1

康家小院 77

四妹子 115

十八岁的哥哥 191

最后一次收获 241

附一 陈忠实著作年表(1982—2012) 284

附二 堂庑渐大:陈忠实过渡期小说创作状况(李建军) 288

蓝袍先生

我的启蒙老师徐慎行先生，年过花甲，早已告退，回归故里，住在乡下。他前年秋末来找我，多年不见，想不到他的身体还这样硬朗。

他住在塬上的杨徐村，距我居住的小河川道的村子，少说也有二十里远，既不通汽车，也不能骑自行车。他步行二十余里坡路，远远地跑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我帮他什么事情。他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水和卷烟，坐稳之后，首先说明他没有什么事，只是找我闲聊。他确实只是闲聊。整整一个下午过去，天色将暮时，他顶着一顶细草帽又告辞了。他说他在三个多月前埋葬了老伴，过了百日，算是守完了节，心里实在孤寂得受不了，才突然想到来找我聊聊的。我信了他的话。老伴初逝，女儿出嫁，男娃顶班在县城小学教体育，屋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怎能不感到孤独和寂寞！我心里也有一缕悲怜的气氛了。

腊月里，入冬以来的头一场好雪，覆盖了塬坡和河川，解了冬旱，大雪封锁了道路，跑小生意的农民挂起秤杆，蒙住被子睡觉了。大雪初霁的中午，奇冷奇冷，徐慎行先生又走进我的院子，令我惊叹不已。他的身上和胳膊肘上，膝头和屁股上，粘着融雪的水痕和泥巴，两只棉鞋灌满了雪粒，湿溜溜的了，可以肯定，他在坡路上跌翻过不知多少回。又是孤独和寂寞得受不了了吗？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徐慎行先生呷了一口茶，就直截了当地开了口。他的脸上泛出红光，许是跋涉艰难累得冒汗的原因，而眼里却泛出一缕羞怯神色，与六十岁人的气色很不协调。他终于告诉我，说是别人给他介绍下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他已见过一面，颇以为合宜。可是两个女儿和儿子均是一口腔反对，没法说服他们。他自己当然不好直接与儿女商议，只好托亲友给儿女做解释。他的大女儿嫁到小河川道的周村，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人也认识，于是就想着让我去给他做大女儿的解释工作。

我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

第二年春天,草木发芽了,一直没有见他的面,不知他的婚事进展如何,我倒有点惦念不下。我和他的大女儿以及女婿都是熟人,话可以敞开说,我说了许多条该办的好处,譬如徐老先生的吃饭穿衣问题、生病服药问题、家务料理问题,统统都解决了,对于儿女们,倒是少了许多负担。又解释了儿女们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老汉退职薪金的使用,会不会被那个老婆子揽光卡死了?终于使他们夫妇点了头,表示不再出面干涉,我也算是给启蒙老师尽了一点心。我随之就担心他的二女儿和儿子的思想通了没有,据说主要阻力在二女儿身上,她不出面,却纵容唆使弟弟出面闹事……

徐慎行先生来了,是在河川和塬坡上的桃花开得正艳的阳春三月。他一来,我从他的眼里流露出来的羞怯神色就猜出了结果。

“我想忙前把这事办了。”他说,“到时候,你能否抽空来坐坐?”

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老师的邀请。

他坐下喝茶,抽烟,说那个老婆的脾气和身世。从他的语气里可以听出来,他是挺满意的。说到她的人样、她的长相,他说能看出她年轻时很俊……

我实在想不到,夏收之后,他第四次来到我家的时候,又是一脸颓唐的神色,先哀叹了三声,说那件事最后告吹了!

我很惊诧,忙问他,到底哪儿出了差错?谁又从中坏事了?

“谁也没有坏事,也没有啥差错——”他淡淡地说,“是我不办了!”

“为——啥?”我不得其解。

“唉——”他摇摇头,叹息着,不抬头,“我事到临头,又……”

既然他觉得不好开口,我也就不再强人之难,于是就聊起闲话。他轻轻摇着扇子,眯着眼,扯起他三十多年教书生涯中的往事,一阵阵哀叹,一阵阵动情……

我送他走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感到压抑,一种被铁箍死死地封锁着的压抑,使人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他却在那道无形的铁箍下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不能解脱……

读耕传家

南塬上的村庄,不论是千儿八百户的大村,抑或是三二十家的小庄,村巷整齐,街道规矩,家家户户的街门沿街巷开设,坐北一律坐北,朝南一律朝南,这一家的东山墙紧紧贴着那一家的西山墙,而自家的西山墙又紧挨着另一家的东山墙,拥拥挤挤,不留间隙。俗话说,亲戚要好结远乡,邻居要好高打墙。家家户户在自家的庄院里筑起黄土围墙,

以防鸡刨狗窜引起纠纷和口角。院墙临街的中间开门，门上很讲究地修一座漂亮的门楼。

那儿的农民十分注重修饰门楼。日子富裕的人家修建砖木门楼，多数人家则是土木门楼。无力修建门楼的人家，就只好在土围墙上凿开一个圆洞，安一个荆条编织的篱笆门，防贼亦挡狗。生人进入任何一个村庄，沿着街巷走过去，一眼溜过两边高高矮矮的各姿各式的门楼，大致就可以划出各家的家庭成分了。不过，这是解放初期的旧话。现在，门楼的规模和姿势，已经与土改时定的那个成分关系不大了；如果按着旧的习惯去猜度，准会闹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来。

门楼正中，一般都要挂门匾，门匾上镌刻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的选择，实际是这个门楼里的庄稼主人的立家宣言。解放后，庄稼人心劲高涨，对门楼上的门匾的选择，免不了受时风的影响，土地改革时，好多人喜欢用“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合作化时又时兴“共同富裕”“康庄大道”；三年困难时期又流行起“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及至“四清”和“文革”运动接连不断的十余年中，诸如“红日高照”“万寿无疆”“斗争为纲”、“真学大寨”等政治口号，确实风靡一时。

解放前门楼题匾的内容，可就单调得多了。凡是能修建得起砖木门楼或稍微像样的土木门楼的殷实人家，题匾上的立家宣言，十之八九都选用“耕读传家”四字，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杨徐村，在南塬上的稠如星海的乡村里，只算个中小型村庄，二百多户农家中，门楼修葺得最阔气的是大财东杨龟年家的。水磨青砖，雕梁画栋，飞檐翘角，俨然一座富丽堂皇的四角亭子。门楼下蹲着两只青石雄狮，墙上刻着飞禽走兽。门楼正中，在象征着吉祥永久的鹤鹿图像中，刻下四个篆体“耕读传家”的题字，与团团祥云相谐调。杨龟年的大儿子在咸宁县政府做官员，家里有百余亩河川水浇地，整整两槽高骡大马，真是有耕有读，宣言与实际相一致。其余那些虽然也能修得起土木门楼的殷实户，也东施效颦地题下“耕读传家”的门匾，却大都是有耕无读，名不副实，甚至一家老少尽是些目不识丁的粗笨庄稼汉子。但作为立家宣言，自然主要是照亮后世，无读书人的缺憾，必当由后辈人来弥补。

杨徐村另一户能修得起砖木门楼而且名副其实的“耕读传家”的人家，当推我家了。

我爷爷徐敬儒，对“耕读”精神的尊崇，甚至比杨龟年家还要纯粹。杨龟年的大儿子在县府供职，主要是为官而不从读了；二儿子从军要枪杆子而鲜动笔杆子了；家里的庄稼全靠长工和短工播种和收割而无须杨龟年动手抬脚。我爷爷徐敬儒，那才是“耕读”精神的忠诚信徒和真正的实践者。

我爷爷徐敬儒，人称徐老先生，是清帝的最末一茬秀才，因为科举制度的废止而不能中举高升，就在杨徐村坐馆执教，直到鬓发霜染，仍然健坐学馆。也不知出于什么思

想影响,我爷爷把门楼上那副“耕读传家”的题匾挖掉了,换上一副“读耕传家”的题匾,把“耕”和“读”的位置作了调换。字是我爷爷写的,方方正正,骨架峻嶒,一笔不苟,真柳字体,再由我父亲一笔一画凿刻下来。我父亲初看时,还以为我爷爷笔下失误,问时,爷爷一拂袖子,瞪了儿子一眼,没有回答。我父亲不敢再问,却明白了是有意调换而不属笔误,该当慢慢地去体味,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凿刻起来。

更有一件蹊跷的事。我爷爷垂老之时,对我父亲兄弟三人做了严格分工:一人继承他坐学馆,体现“读”;二人做务庄稼,体现躬耕;世世代代,以法累推。这样的分工,兄弟三人还勉强接受得了,临到爷爷咽气时,又留下严格的家训,可以归纳为“三要三不要”的遗嘱。其训示曰:教书的只做学问,不要求官为宦;务农的要亲身躬耕,不要雇工代劳;只要保住现有家产不失,不要置地盖房买骡马。

兄弟三个瞪大眼睛,你瞅瞅我,我瞪瞪你,不知所措了。他们三个正当盛年,早就想着齐心合力一展宏图,在杨徐村与杨龟年家争一争高低。近几年间,杨家兵强马壮,置田盖房,百业兴旺,已成为方圆十里八村新兴的富户。眼看着杨家小河涨水似的暴发起来。兄弟三人对父亲拘拘谨谨的治家方针早已多所不满,又不敢说,想不到老先生活着时限制他们的手脚,临走前还要把他们死死地捆绑在这点小家业上。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摸算计到三个儿子的心数儿,怕自己走后儿孙们有恃无恐,干脆一句话说死:不遵从父训者,孽种也!不许给他上坟烧纸。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隐忍,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遵循老先生的遗训,耕田的躬耕垄亩,坐馆的潜心静气研读圣贤诗书。村里人把我爷爷这种古怪的治家训诫编成顺口溜,“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当作笑话流传。

嗬呀!到得杨徐村一解放,杨龟年家耍枪杆子的老二死在解放军的枪口之下;当县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监牢当中;家里的深宅大院、高骡子大马以及水地旱田全部分给杨徐村的贫雇农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个,捧着我爷的神匣,磕头作揖,又哭又笑,简直跟疯癫了一样。夜静以后,兄弟三个又跑到村后的坟地里,趴在我爷的坟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开坟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遗训的先知先觉的老祖宗的尸骨抱在怀里亲一百次!该怎样感激老祖宗——比诸葛孔明还要神明的老祖宗啊!亏得他早已看破红尘,留下严格的治家遗训,使得儿孙后辈免遭杨家的横祸!我们家被定为上中农成分,虽然不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却也不在被打击被孤立的剥削阶级的圈子里,这已经是万幸了!

我爷爷瞑目前五年,已经选定我父亲做他的接班人,去杨徐村的私塾坐馆执教。据说,老先生在长期的观察中,觉得我大伯父工于心计,善于谋划,带一股商人的气息。二伯父脾气拗倔,合当是一介武夫。我父亲自幼聪灵智慧,既不像大伯父那么诡,也不像二伯父那样倔,深得老先生钟爱器重,加之对我父亲的面相也满意(用我爷的话说,天庭

饱满，眉高眼大，肤色滋润），于是就在他年过花甲之后，由我父亲坐上了私塾里那把黑色的令人敬慕的太师椅子。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服孝，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当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一副冷峻威严的神气。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两位伯父说话以外，与俩伯母和七八个侄儿侄女，从不搭话。除了两位伯父，没有不怯他的。父亲从学堂放学回来，一进街门，咳嗽一声，屋里院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侄儿侄女们停止了嬉闹，伯母和母亲烧锅拉风箱的声音也变得低匀了。我和堂兄堂弟们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亲站在当时，无须动手动脚，他只用眼一瞅，我们就都不敢出声了。他倒是从来不动手打孩子，可也从来不对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许的亲昵，我似乎比堂哥堂弟们更怯着父亲。

我现在唯一能解释父亲这种性格变化的原因，是爷爷死后父亲在这个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里的地位的变化。爷爷死时，意外地打破了长子主事的传统法则，把全部家事委于父亲来统领。据说爷爷怕伯父太诡而远伤乡邻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气暴烈而招惹家祸，于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亲统领这个家庭。他要领导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要处理三兄弟三妯娌以及九个侄儿侄女和亲生儿女的种种矛盾，要处理这个家庭与远远近近几十家新老亲戚的关系，要处理与杨徐村二百多户同姓和异姓的乡邻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我当时尚不能体味父亲的种种难场，只觉得他的脸上，笑颜永远消失了。

尽管父亲在这个家庭里严于律己——母亲、姐姐、弟弟以及我，宽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庭里的摩擦总不会间断，只是没有公开闹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来对父亲统领家事就觉得有失面子，再加上三条遗嘱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终日憋气。他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意欲送到西安去学做生意，因为父亲坚持遗训而不能成行，有气无处发泄，就哄唆直杠子二伯发难。父亲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隐忍，不理睬二伯的恶火，大伯也就无法了。

这样下去，终非久远之计，父亲不能眼看着这个以礼仪之风在全村享有最高乡誉的家庭，在自己手中闹出分崩离析的结局，令杨徐村人耻笑。他断然决定，从学堂里告退回家，统领家事。他自己在学堂执教，一心难为二用，顾了学堂顾不了家，顾了家庭又怕贻误人家子弟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学堂里的时候，家里和地里，给

大伯留下了毫无顾忌地唆弄是非的太大的时空环境。这样,在我刚刚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推到他坐过的那把黑色的太师椅上了。

蓝袍先生

父亲选定我做他的替身去坐馆执教,其实不是临时的举措,在他统领家事以前,爷爷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意培养我作为这个“读耕”人家的“读”的继承人了。只是因为家庭内部变化的缘故,才过早地把我推到学馆里去。

我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一个弟弟,脾气颇像二伯,小小年纪就显出倔拗的天性,做教书先生的人选,显然不大合适,“人情不够练达嘛”!父亲再无选择的余地,尽管我也是差强人意,也没有办法了。如果说父亲也暗藏着一份私心,此即一例,大伯父的二儿子灵聪过人,然而父亲还就是选了我。

读书练字,自不必说了,对我是双倍的严格。尤其是父亲有了告退的想法之后,对我就愈加严厉了。父亲用那柳木削成的木板,开始抽打我的手心,原因不过是我把一个个字的某一画写得离失了柳体,或是背书时仅仅停磕了几秒钟。最重要的是,对我进行心理和行为的训练,目标是一个未来的先生的楷模。“为人师表”!这是他每一次训导我时的第一句话。

“为人师表——”父亲说,“坐要端正,威严自生。”

我就挺起胸,撑直腰杆,两膝并拢。这样做确实不难,难的是坚持不住。两个大字没有写完,我的腰部就酸酸的了,两膝也就分开了。猛不防,那柳木板子就拍到我的腰上和腿上,我立即坐直。几次打得我几乎从椅子上翻跌下去,回头一看,父亲毫不心疼地瞅着我。

“为人师表——”父亲说,“走有个走势。走路要稳,不急不慢。头仰得高了显得骄横,低垂则萎靡不振。两目平视,左顾右盼显得轻佻……”

我开始注意自己走路的姿势。

“为人师表——”父亲说,“说话要恰如其分,言之成理。说话要顾及上下左右,不能只图嘴头畅快。出得自己口,要入得旁人耳……”

所有这些训导,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十七八岁的人来说,虽然很艰难,毕竟可以经过日渐长久的磨炼,逐步长进,最使我不能接受的,是父亲对我婚姻选择的武断和粗暴。

对于异性的严格禁忌,从我穿上浑裆裤时就开始了。岂止是“男女授受不亲”,父亲压根儿不许我和村里任何女孩子在一块玩耍,不许我听那些大人们在一起闲谰时说的

男女间的酸故事。可是,在我刚刚十八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决定给我完婚了。他认为必须在儿子走进学堂之前做完此事,然后才能放心地让我去坐馆。一个没有妻室的人进入神圣的学堂,在他看来就潜伏着某种危险。

父亲给我娶回来多丑的一个媳妇呀!

婚后半个月,我不仅没有动过她一指头,连一句话也懒得跟她说,除了晚上必须进厢房睡觉以外,白天我连进屋的兴趣都没有。我却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父母之命啊!

父亲还是看出了我的心意,有一天,把我单独叫进他住的上屋,神色庄严。

“你近日好像心里不爽?”

“没有。爸。”

“我能看出来。有啥心事,你说。”

“爸,没有。”

“那我就说了——你对内人不满意,嫌其丑相,是不是?”

“……不。”

我一直未敢抬头,眼泪已经忍不住了。

“这是我专意儿给你择下的内人。”父亲说。我没有想到。他说:“男儿立志,必先过得美人关。女色比洪水猛兽凶恶。且不说商纣王因妲己亡国,也不说唐王因贵妃乱朝,一个要成学业的人,耽于女色,溺于淫乐,终究难成大器……”

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那严峻的眉棱下面,却是满眼的赤诚,坦率的诚意,使我竟然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大丈夫立国安家成学业,怎能贪恋女色!我长到十八岁,从来没有听过怎样对待婚娶的道理,父亲今天第一次坦诚地对我训导,我悟出人生的道理了。

父亲当即转过头,示意母亲,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件蓝袍,交给我,叫我换上了。我穿上那件由母亲亲手缝的蓝洋布长袍,顿然觉得心里咯噔一声,沉重起来,似乎一下子长大成人了!服装对于人,不仅是御寒的外在之物。穿起蓝袍以后,抬足举步都有一种异样的庄重的感觉了。

父亲领着我走出上房的里间,站在外间里。靠墙的方桌上,敬着徐家祖宗的牌位,爷爷徐敬儒生前留下一张半身照,嵌镶在一只楠木镜框里,摆在桌子的正中间。父亲亲手点燃大红漆蜡,插上紫香,鞠躬作揖之后,跪伏三拜,然后站在神桌一侧,朗声道:“进香——”

我走前两步,站在神桌前头,从香筒里抽出五根紫香,轻轻地捋一捋整齐,在燃烧着的蜡烛上点燃,小心翼翼地插进香炉,抖索的手还是把两支弄断了。重插之后,我垂首

恭候。

“拜——”父亲拖长声喊。

我抱起双拳，作揖。

“叩首——”

我跪在祖宗神牌前，磕了三个响头，就抬起头，等待父亲发令。

父亲从腰里掏出一片折叠着的白纸，展开，就领着我向祖宗起誓：

“不肖孙慎行，跪匍先祖灵前。矢志修业，不遗余力。不慕虚名，不求浮财，不耽淫乐。只敬圣贤，唯求通达，修身养性，光耀祖宗，乞先祖护佑……”

父亲念一句，我复诵一句，及至完毕。我呆呆地站在灵桌前，诚惶诚恐，不知现在该站还是该走开？父亲紧紧盯着我，说：

“明天，你去坐馆执教！”

由我代替父亲坐馆的仪式是在文庙里举行的。时值冬至节气。一间独屋的庙台上，端坐着中国文化的先祖孔老先生的泥塑彩像。屋梁上的蛛网和地上的老鼠屎被打扫干净了。文庙内外，被私塾的学生和热心的庄稼人围塞得水泄不通。杨徐村最重要的最体面的人物杨龟年，穿着棉袍，拄着拐杖，由学堂的执事杨步明搀扶着走进文庙来了，众人抖抖地让开一条路。

我站在父亲旁边，身上很不自在，心里却潜入一股暗暗的优越感来。这儿——文庙，孔老先生的圣像前，排站着杨徐村所有的头面人物，我也站在这里了，门外的雪地上，挤着那些粗笨的却又是热心的庄稼人，他们在打扫了房屋以后，临到正式开场祭祀的时候，全都自觉地退到门外去了。

杨步明主持祭祀，首先发蜡，然后焚香，接着在杨步明拿腔捏调的诵唱中，屋里屋外的所有参与祭奠的村民，无论长幼尊卑，一律跪倒了。油炸的面点，干果，在杨步明的诵唱中摆到孔老先生面前。整个文庙里，烛光闪闪，紫香弥漫，乐鼓奏鸣，腾起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

执事杨步明把一条红绸递给杨龟年，由杨徐村最高统治者给我的父亲披红，奖掖他光荣引退。杨龟年双手捏着红绸，搭上父亲的右肩，斜穿过胸部和背部在左边腋下系住。我看见，父亲连忙跪伏下去，深深地磕拜再三，站起身来的时光，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个冷峻的人，竟然流泪了。他硬是咬着腮帮骨，不让眼泪溢出眼眶。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往昔里，我既看不到父亲一丝笑颜，也看不到一滴泪花。那泪眼里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动人之处，令人敬服，又令人同情。这个严厉的父亲，从来也不会使人产生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他的脸色和眼神中永远呈现着强硬和威严，只能使人敬畏，而不

容任何人产生怜悯。现在，他的脸上像彤云密布的天空扯开一道缝儿，露出了一缕蓝天，泻下来一道弱柔动人的阳光。

父亲简短地说了几句真诚的答谢之辞，执事杨步明代表所有就读的孩子的家长向父亲致谢，并对我的上任多有鼓励。杨龟年没有讲话，只是点点头，算是最高的赏赐了。

奠祭活动一结束，我随着父亲走出文庙，刚一出门，那些老庄稼人就把父亲围住了，拉他的袖子，拍他的后背，摸抚那条耀眼的红绸，说着听不清的感恩戴德的话。我站在旁边，同样接受着老庄稼汉们诚心实意的鼓励的话，心里很激动。由爷爷和父亲在杨徐村坐馆所树立起来的精神和道义上的高峰，比杨家的权势和财产要雄伟得多！我从今日开始，将接替父亲走进那个学馆，成为一个为老少所瞩目的先生了！

那把黑色的座椅，那张黑色的四方抽屉桌子，能否坐得稳？一直到将来再交给我的尚未成形的某一个后代，大约至少要二十多年吧？二十多年里不出差错，不给徐家抹黑，不给杨家留下话柄，不落到被众人撵出学堂，谈何容易！要得到一个善终的结局，就必得像父亲那样……

乡村的私塾学堂也放寒假，每年农历的冬至节气就是下学日，祭过老祖宗孔老先生之后，就放假了。

过罢正月十五，私塾又开学了，我穿上蓝布长袍，第一次去坐馆，心里怎么也稳实不下来。走出我家那幢雕刻着“读耕传家”字样的门楼，似乎这村巷一夜之间变得十分陌生了，街巷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树木，一搂抱粗的古槐、端直的白杨、夏天结出像蒜薹一样的长荚的楸树，现在好像都在瞅着我，看我这个十八岁的先生会不会像先生那样走路！那些拥拥挤挤的一家一户的门楼里，有人在窥视我可笑的走路的姿势吧？唔呀！从我家的街门口到学堂去，要走到街心十字口，再拐进南巷，距离不近哩！不管怎样，我已经走出街门了，没有再退回去的余地了，只有朝前走。这时候，像面对一个十分面熟而又确实读不出字音的生字时顺手掀开字典，我想到了父亲走路的姿势。我多少次看见父亲来去学堂时走在村巷里的身姿，而他训导我的如何走路的条文倒模糊了。

我抬起头，像父亲那样，既不仰高，也不低垂，两目平视，梗直脖根，决不左顾右盼，努力做到不紧不慢，朝前走过去。

“行娃……哦……徐先生……”杨五叔笑容可掬地和我打招呼，发觉自己不该在今天还叫我的小名，立即改口，脸上现出失误的歉疚的神色，“你坐馆去呀？”

“哦！对。”我立即站住，对他热诚的问话表示诚意的回答，站下以后，却又不知再该说什么了。我立即意识到，不该停下脚步，应该像父亲那样，对任何人的纯粹出于礼节性的见面问候之辞，只需点一下头，照直走过去，才是最得体的办法……我立即转身走了。

走进学堂的黑漆大门了，三间敞通的瓦房里，学生们已经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摆满了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方桌和条凳，排列整齐，桌子四周围坐着年龄差别很大的学生，在哇啦哇啦背书。今日以前的七八年里，我一直坐在这个学堂的左前排的第一张桌子上，离安在窗户跟前的父亲的那张教桌只隔一个甬道。这个位置是父亲给我选定的，从第一天进入这学堂接受父亲的启蒙，直到我今天将坐在窗前教桌的位置上，一直没有变动过。我打第一天就明白，父亲要把我置于他的视力首先所能扫描到的无遮蔽地带……现在，那个位置坐上新进入学堂的启蒙生了。

除了新添的几个启蒙生，教室里坐着的全是那些春节以前和我同窗的本村的熟人、同伴、同学，有的个子比我长得还高还壮实。我今天看见他们，心里却怯了。我完全知道他们和我父亲捣蛋的故技，尤其是杨马娃和徐拴拴两人，念书笨得跟猪差不多，却尽有鬼点子捣蛋。我一进门就瞅见他俩的诡秘的脸相，倒有点怯场了，那些不怀好意的脸相！

我立即走向那张四方教桌，偏不注意那几个扮着怪相的脸。我在父亲坐过的那把直背黑漆木椅上坐下来，腰似乎自然地挺直了，父亲就是这样挺着身坐。我回忆父亲的工作程序，坐下，先把桌上的四宝摆整齐，抹干净桌子，再掀开书本，或者在砚台里磨墨。一听到教室里有异常的响动，就抬起头来，逡巡一遍，待整个学堂里恢复正常的气氛，再低头看书或者练习写字。

父亲一般是先读书的，后晌上学时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只是今天例外，读书是难得专注的，写字肯定对稳定情绪更好些。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根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磨墨也该像个先生磨墨的姿势，不能像下边那些学生乱磨，最好的姿势当然只有父亲磨墨的姿势了。

墨磨好了。桌子角上压着一沓打好了格子的空影格纸，那是学生们递上来的，等待我在那些空格里写上正楷字，他们再领回去，铺在仿纸下照描。我取下一张空格纸，从铜笔帽里拔出毛笔，蘸了墨，刚写下一个字，忽然听到耳边一声叫：

“行娃哥——”

我的心一扑腾，立即侧转过头去，看见本族里七伯的小儿子正站在当面，耍猴似的朝我笑着：“给我题个影格儿。”

教室里腾起一片笑声。哦！应该说学堂。

笑声里，我的脸有点发热，有点窘迫，也有点紧张。学童入学堂以后，应该一律称先生，怎能按照乡村里的辈分儿叫哥呢！可他是才入学的启蒙生，也许不懂，也许是忘记了入学前父母应有的教导吧！我就只好说：“你放下，去吧！”他回到位置上去了，笑声消失了。